

国际政治论坛

(俄)米哈伊尔·杰里亚金/著

МИХАИЛ ДЕЛЯГИН

РОССИЯ
ПОСЛЕ ПУТИНА

后普京时代

——俄罗斯能避免橙绿色革命吗?

国际政治论坛

(俄)米哈伊尔·杰里亚金 著
МИХАИЛ ДЕЛЯГИН
金禹辰 项 红 译

РОССИЯ
ПОСЛЕ ПУТИНА

后普京时代

——俄罗斯能避免橙绿色革命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普京时代：俄罗斯能避免橙绿色革命吗？/[俄]米哈伊尔·杰里亚金著；金禹辰，项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9

(国际政治论坛)

ISBN 7-80230-143-2

I. 后… II. ①米… ②金… ③项… III. 政治体制
改革－研究－俄罗斯 IV.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5723 号

МИХАИЛ ДЕЛЯГИН

РОССИЯ ПОСЛЕ ПУТИНА

©Делягин М. Г. ,2005

©ООО«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Вече》, 2005

本书中文版由莫斯科维切出版社授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出版发行。

根据 2005 年俄文版译出。

前　言

是垂死挣扎还是复兴？

在长达 5 年多的时间里，“普京”这个词是一个很好的商标。在这个词下几乎可以随便兜售任何东西——许多善于钻营的商人，包括出于政治原因，借此积聚了不坏的资本。一些人急于搭上最后一班车，也正在积蓄资本。

然而普京的第一任期已结束，在官方忙乱的宣传后面，在官方统计数字的隐忧后面和蒙昧无知的日常生活背后，一个简单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晰：“下一步该怎么办？”

普京之后的俄罗斯会是什么样的，它还能继续存在吗？

寻常的生活与生存方式正在逝去。

俄罗斯社会乃至我们每个人，再次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火山口，并已感受到那滚烫岩浆的冲动。

当然，这种局面与宪法无关，也与任何人为的法律无关。根据宪法，普京应该在 2008 年卸任。

一方面，俄罗斯现政权给人造成一种丝毫不重视法律的固定印象，于是在谈到依据相应的法律条款不可避免地要更换总统的时候，就会被迫触及一个问题，这是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一个纳粹战犯向一名年轻的美国观察家提过的问题，即“为什么恰恰是这个条约你们突然决定不违背了呢？”^①

^① 约·卡·戈尔布雷特：《我们时代的生活》，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6。

而另一方面，实际上，如果法律本身不好，那么为什么要执行它呢？或者至少暂时还没有真正地执行得好的法律？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普京之后的俄罗斯将是什么样的，在这样的俄罗斯社会里的生活将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的产生绝不仅限于依据宪法规定临时找到一个俄罗斯人当总统。

如果问题最终归结到这一点的话，那就不会有任何疑问了，即现在的政治家被另一位政治家取代，但不是作为继承者，而是作为反对者，后者吸取了前者政策中的合理成分，并补充进自己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理念。

普京后时代转折的不可避免性以及俄罗斯社会中潜藏着的恐慌心理源自一个更强大的意识，即俄罗斯当前的领导人将不是由于法律和习惯势力、不是由于外在的或潜在的力量失去权力，而是因自身政策导致的混乱而失去权力。应当还权力以应有的面目，政策应该具有完整性和循序渐进性。

关于这一点，本书第1部分将有更详尽的描述和分析。我在此仅列举其中最主要的特征：

- 给予被视为现行制度主要社会基础的官僚们以充分的自由，使他们免于因自己的行为而承担任何责任，而这些行为不仅造成腐败盛行，而且导致大量的不履行自己义务的现象发生，并由此造成国家管理的瘫痪；
- 力图将权力集中在强力寡头手中，这些寡头服从于叶利钦时期的商业寡头并通过掠夺和强迫大商人与中小商人的方式实现了个人的暴富，当然出于习惯和为了个人的满足，他们也压迫普通百姓；
- 不仅破坏社会大众和弱势群体的福利，而且破坏他们的生存环境（通过“福利货币化”和一揽子其他的自由化改革），尽管有着超乎寻常好的经济行情，但仍要掠夺百姓的钱并聚敛于商人手中，目的就是为了再把它们通过贿赂的方式转移给强力寡头；

- 制度性的撒谎与诽谤，调查异己和反对派，对潜在的政治对手进行预防性的恐吓，加重社会的恐慌气氛；
- 采取戈尔巴乔夫式的做法，一步步地通过讨好我们的战略对手的方式放弃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的利益，以寄希望于后者对上述非民主和非人道的政策（这些政策客观上对他们自己也有利）视而不见；
- 在强力寡头内部也是纠纷不断，这些寡头的无助感也在加强。他们也已无法摆脱甚至是自己朋友和伙伴的压制（当然，这也招致这一制度的建立者和为它服务的人的不满）。

这种政策不能带领国家摆脱贫难，由此对现状和未来产生恐慌也是很合理的了。

就像任何自杀行为一样，这一政策不可能走得太远。

这种政策的唯一后果就是全面的制度性危机。今天它可能已被视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所有在普京执政时用各种方式帮助他的人，尽管目前在形式上还留在他身边，但已确信不可能再帮他了。要知道，上述政策不是那种尽管很难但仍然可以纠正过来的错误或蓄谋的产物，而是各种残酷而又稳定的利益均衡的结果，而这种均衡是无法打破的。

从国家头脑中开始的“独裁主义痉挛”让整个国家抽筋。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陷入制度性危机的速度要比我们认为的或者用各种数学模型测算出来的速度还要快，因为不论是我们的正常思维，还是数学模型都无法衡量已蔓延到强力寡头内部纷争的破坏性。同样无法衡量的还有领导层的无知以及他们有意识的不负责任（后者的影响可以参照 2004 年 7 月的“银行危机”模式来理解，这一危机实际上已演变成持续至今的中央银行危机）。

作者在 2005 年初写这一段内容的时候，可以确信一点：制度危机完全不会在 2006 年春季前，而是在 2006 年秋天发生。在

这段时期，所积累的“安全系数”（其中包括社会乐观情绪和对国家的信任^①）是足够的。

这段时间是给俄罗斯社会学习的时间。

是给俄罗斯社会内部自组织的时间。

是筹备各种力量的时间。

如果我们能从自身找到力量（时间还是很充足的），并以应有的方式对制度危机做好准备，我们就有可能利用赐予我们的机会实现政治现代化，并建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同时我们还可以开辟出一条经济现代化之路，以保证国家振兴和人民生活的正常。俄罗斯国家的复兴，应当引起她的公民的自豪与自信，而不是痛苦和耻辱。

这是历史赋予俄罗斯复兴的最后机会。如果我们不抓住它，那么我们目前经受的濒死状态就会以死亡结束，而且不是西方那些专家们预测的 2010~2015 年，而是更早。

我们能抓住这次机遇吗？

我们还有自己的未来吗？

这些问题无法用口头或书面的话语来回答，因为这是历史的提问，而历史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来创造的。我们只能用我们的事业，用我们的生命来做出回答。

但要想能够做出回答，我们就应当极其清醒地看到，哪怕只是意识到这些越来越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如果现在，在我们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危机和已经到来的危机阶段，我们对国家

^① 根据 2004 年 12 月 31 日“莫斯科回声”电台对听众的问卷调查，87%（调查对象为 9156 人）的听众不想看到普京在 2005 年仍在总统位子上。同时根据尤里·列瓦达分析中心（其研究范围涵盖全体国民）的资料，2004 年 12 月（问卷时间从 12 月 10 日至 12 月 14 日）赞同普京在总统职位上的活动的为 69%，不赞同的只有 28%。而 2005 年 1 月 21 日至 24 日赞同的比例为 65%，不赞同的为 32%。

还是采取某种教条主义的误解，把它推给那些很讲究效率的掠夺者（抱歉，差点用“经理”这个词）和伪装成爱国主义的强盗们，那么我们就再也不会有自己的国家了——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而我们——如果我们还活着的话——不仅将在那些上流国家，而且在那块我们不久前还称之为祖国（很可能我们还会以某种说不清的原因这样称呼它）的唯一的国家，成为孤立无援的、没有任何权利保障的、一无所有的乞食者，将成为被所有人视为异己的人，谁也不需要的人。

今天，在我们眼中，俄罗斯已不是电视中的那样，在很多方面也不再像从前一样受人尊敬，许多人已不像从前一样会对总统产生真诚的好感，但也不是那些表现出毫无理由的侵略性的、洋洋得意的强力寡头的“强盗口中食”^①。

俄罗斯以及我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是一片混乱。我们可以不经受即将来临的制度危机。

仅从个人损失的角度看，就像不会经受在塔吉克斯坦内战中数十万人死亡，以及在破坏苏联的未经公布的战争中所经受的数万人死亡一样。

我不是说我们会由于战争、犯罪而失去这些人，而是指由于贫穷和毫无出路可能失去自己的家园，就像失去数千万我们的同胞一样。

我也不是说，饥饿会把我们每个人变成什么样。那些知道真相的人会明白我在说什么，而那些不知道的人还是读读沙拉莫夫的作品吧。

俄罗斯以及我们每个人，不无任何夸张地说，在目睹着自己走向灭亡。

^① 符·别里文第一个把人的特征按这样的标准划分。

这不是隐喻，不是恐吓，也不是歇斯底里，只是对我们今天所处的已经很清楚的事实的确认而已。

当然，可以毫无顾忌地用简单的手段赢得几个月的时间，要么是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但而后却是提高制度危机的破坏性以及灭亡后果的可能性。这种选择本身是合理的，因为不愉快的事将随后来到，而满足是现在得到的（仅仅是预支而已），但这是摧毁性的、自我破坏的合理性。

如果我们想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保留下，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身还有未来，我们应当意识到最近半年来的危机性，因为在 2006 年秋天，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今天我们重又回到了历史的不确定性状态，如果你想成为某种人，你应该一开始就成为他。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你应该一开始就掌握它。

如果你想拥有什么权利，哪怕只是自己的生存权，你就应该准备在激烈或可能是残酷的斗争中捍卫它。

相对文明的喘息阶段，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震荡期后的“渴望稳定”阶段已经结束。历史再次闯入每个家庭平静的生活中，我们重又面临着捍卫自己祖国的权利。

我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提高我们共同的胜利机会，提高我们生存与实现现代化的机会。

我留在俄罗斯并为此而奋斗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相信：我们必胜。

我不知道在火星上是否有生命，但在普京之后，俄罗斯将依旧存在。



引言

俄罗斯的现代化方案： 对真理的诉求

一 需要新的发展方案

在俄罗斯整个经济改革或者广义上的社会改革时期，改革都是在自由主义方案基础上展开的，而且都是与盖达尔、丘拜斯和亚辛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种自由主义方案解决了它原则上能解决的那些问题，同时也耗尽了自己的潜力。至少在 1995 年大规模的“债务危机”后，人们已不再怀疑它的局限性及其对俄罗斯继续发展的不适应性，也就是说，人们的这种认识迄今已有 10 年时间了。

但是不管听起来多么离奇，能够保证解决被自由主义方案忽视或加重了的那些问题的一揽子替代方案，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制定出来。不管对苏联的怀念程度有多么深、多么强烈，包括在政治方面，这种感觉从未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应有的表达，也从未能找到应有的表达方式，并由此停留在集体的幻痛状态，尽管这种痛感强烈而令人难以忘却。

其原因显而易见，就在于缺少对深入研究替代性的非自由主义方案感兴趣的社会力量。实际上，自由主义方案尽管目前已在俄罗斯根深蒂固，但其制定的基础却是在西方（正因为如此，

它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一揽子方案，而不是作为推广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方案而被俄罗斯接受的）。这一点已毋庸置疑。

尽管这种全面公开的研究远没有体现华盛顿共识的基本要义，但它却首先被用于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主义方案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解决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及其公司当前利益（其中包括商业利益）的基本方法。但就其当前利益的所有着眼点而言，这种方案因自身的天性在客观^①上不仅是使西方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首先是前苏联，现在不仅包括中国（对目前的西方世界来说，中国显然“啃不动”），还有俄罗斯——发生动摇，使其服从于西方，而且还要给它们造成破坏。

这样一来，如果说自由主义方案是西方当前与战略利益的真正集大成者，并有最适合、最自然的行动配合，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任何一个有分量的政治力量都不需要俄罗斯的现代化。重要的是，不仅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对手不需要这种现代化，就连俄罗斯本身也不需要。今天，代表俄罗斯的几乎所有的力量几乎已习惯性地在消耗前苏联的遗产（而且主要是非再生性遗产）。随着世界原料价格令人头晕目眩地上涨，石油美元成为了这种消耗的最具竞争力的表现形式。

甚至像俄罗斯这样潜在的、有着明显的全球性影响的大国，它的现代化也选择了自由主义方案，而这种明显具有地方色彩的方案因存在客观的竞争困难又加剧了上述局面（虽说这种方案原则上能够进入全球层面）。困难非常明显，以至于在俄罗斯国家的代言人中间（更不消说在知识分子层面了）仅在对这一问题的简单认识阶段就出现了管理瘫痪。

^① 详见米·戈·杰里亚金：《世界危机，全球化通论》，莫斯科，因弗拉-M出版社，2003。

乌克兰危机部分地改变了这一局面。因为这一危机成为西方（在因美国及其仆从国入侵伊拉克而多次表现出分裂迹象后，西方组成了统一战线）针对俄罗斯展开的全球竞争的公开行动。随着这一危机的扩散，俄罗斯国家的代言人们开始痛苦地意识到，由于非常客观的原因，他们的无效率使得西方破坏俄罗斯并恢复对它进行外部管理的图谋成为了不可避免，就像在1991～1998年间借助某种“民主的特别手术”做到的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执行这种已被证明毫无指望的自由主义方案，俄罗斯现任领导人注定不仅将毁掉自己的国家（他们在最近15年来对待自己的国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这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类似的现象），而且还有作为统治精英的自身。

因此，缺少可替代的发展方案甚至使巩固国家权力的许多合理努力也都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没有社会发展方案，权力当局不仅无法向社会，而且也无法向自身解释巩固权力的目的；而没有了目标，也就不能明白哪些做法是正确合理的，哪些不是。

特别是，所有努力（在最好的情况下，即假定它们取得了成功）只是为解决俄罗斯社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创造了必要的行政管理条件，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现代化问题。但即便是地位巩固的国家，即便是在实际上而不是纸面上的“纵向权力体系”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

现在不仅没有具体的、更为精准的手段，甚至连解决社会问题的概念也因缺少合适的方案而不存在，付出巨额代价并动员所有微小的力量而建造的手段即便不是毫无意义的，多少也显得为时过早。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张在做出去哪个城市的决定之前购买的飞机票：购买行为原则上是正确的，但由于错误的程序造成一切不得不重来。

二 自由主义方案的意义

如果从自由主义方案形成并像从前那样在俄罗斯实行的角度来看，那么它会因为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无法被接受。这一方案要求国家服从于商业发展的利益，并要从根本上改造国家以适应这些利益。

这样一来，社会利益远远无法与商业利益合拍，推行自由主义方案将很快与社会利益相抵触。特别是，那些与管理或经商无关的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将受到侵犯，往好了说也将被忽视。在俄罗斯，出口商的影响力最大，对他们而言，支付工人劳动报酬不是开发销售市场，而是算作净成本，因此他们往往采取超级过分的形式侵犯雇佣工人（这些属于社会绝大多数）的利益。

非常重要的是，自由主义方案只是在口头上表达了商人的利益。实际上，由于大商人比中小商人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当自由主义方案的支持者因竞争的自然逻辑而坚决反对国家的积极作用时，大商人对中小商人的优势就使该方案转变为反对中小商人的利益，并使后者沦为比他们自身更大的竞争对手利益的牺牲品。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由主义方案的实施者因大商人的利己主义转向反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本身（这一价值观只能由作为全体社会意志代言人的国家来保障）。

同样的原因，由于跨国资本要明显强于民族资本，自由主义方案的实施者将彻底否定本国的民族利益。

当然，这种情况只是在跨国公司利益不完全符合相应国家的民族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果跨国公司规模不大且内部成分复杂，那么它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并入大的跨国公司的技术链条，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这样，任何矛盾以及背叛民族利益的事

就都不会发生。但是这种情况实在太少见了，它完全是作为自由主义经典教科书中的案例来加以研究的。

这样一来，最初作为全社会利益代表的自由主义方案，将逐步蜕变为越来越利己的、与社会和中小商人利益为敌的方案，蜕变为外国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大资本的方案。

这一方案将对社会产生破坏作用，引发内部张力的扩大，增加对国家的敌意，而国家是推行这一方案（其实还包括其他任何方案）的关键角色。当下的俄罗斯社会恰恰处于抗议活动上升和对国家敌意不断扩大的境地。

在经济形势改善的条件下，国家在对难以置信但又显而易见的几乎到处是紧张和不满的局面作出反应的同时，又在本能地试图进行自我巩固。

但国家不是独立的，是不能自由行事的，它只是全社会利益的代表，尽管这种角色是被迫的。由于这种地位，国家只有当自己的活动符合全社会利益的时候，它的活动才可能获得成功。当它眼下继续在不仅已经过时，而且与社会和国家（俄罗斯社会利益的代言人）相敌对的自由主义方案框架内活动的时候，它巩固权力的努力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与此直接相悖的结果。

国家要想取得成功，应当按照其天性，也就是顺应社会利益（在这一点上它与其他所有社会现象没有任何区别）来行动。在当前的俄罗斯，这首先意味着深入研究新的、非自由主义的方案，其目的是保障被自由主义侵犯的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从理论上讲，也就是除俄罗斯大资本和外国跨国资本以外的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

实际上，社会对自由主义方案的反应是本能的、无意识的，并因此具有极端色彩。而新的强力寡头对叶利钦时期的老商业寡头采取的恐吓与破坏的施压形式，可以自动地使现代化方案对大

资本也能产生有益的结果。其中的原因很简单：现代化方案因其系统性而不可避免地用明确的规则框架来改变混乱无序、放任自流的局面，并取代强力寡头针对大资本在一定条件下采用的大规模暴力行为。这些规则框架可能很严格，并具有限制作用，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明确的。相对于今天的状况而言，这对老商业寡头无疑是一种福音。因为“最差劲的稳定也要好过最好的混乱”。

这样一来，与分裂社会的自由主义方案相对立的现代化方案将在客观上发挥巩固、联合和凝聚社会的作用。

三 现代化方案的意义与内涵

现代化方案的最低目标是为俄罗斯社会在现代社会越发严酷的竞争环境中提供有保障的、长期的和集体性的生存条件。这种环境是如此的严峻，以至于对历史功绩、胜利和辉煌的直接表达也成为了有保障的生存条件。

就其本性而言，在全球竞争的条件下，自由主义方案原初的目标并不是保障全社会的生存，而只是为在世界经济中未遇到竞争并因此被自动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个别社会环节（主要是原料部门）提供生存保障。

实质上，这些环节在依靠消灭自身赖以存在其间的社会而获得生存的同时，也被迫将自身视为不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而是世界最发达的一部分，比如“世界共同体”、“人类文明”、“西方”，等等。

现代化方案是对俄罗斯社会所有其他组成部分的回答，这些部分因自由主义方案而失去了未来，并注定要走向衰落、灭绝，变成全球竞争体系中最强大的参与者的肥料。

这一方案的世界观基础是必须将俄罗斯作为全球竞争的统一

主体来研究。整体研究意味着将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特殊的公司来理解，而公司不仅要发展生产，还要开发必要的人力资源^①以及与此有着不间断联系的社会环境。

因此，社会所有的主要阶层和集团即使不是作为平等对象的话，那么也应该作为非常重要的部分来加以研究。通过压制某些阶层和集团（要么是“敌对的”，如对共产党人而言的资产阶级；要么是“不需要的”，如对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言的 2/3 的社会群体）而实现共同发展的理念应当作为非常病态的、非效率的、无法实现的并对社会有破坏作用的理念予以否定。

现代化方案的主要意向——其对社会的潜在寄语是“回归健康思维”——将俄罗斯从“从改革走向正常化”的口号下的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了无生气的危险病态中解脱出来。

在民众意识中，前苏联越发成为了社会制度的理想模式。因此，针对这种意识，现代化的目标是“在市场关系基础上依靠民族资本和现代技术恢复苏联”，当然，“要剔除那些会导致历史性失败的缺陷”。

至少从 2004 年中开始，俄罗斯已开始尝试（包括已经意识到，西方会对此做出如何病态的反应）实现这一设想，但由于执政官僚集团的利己主义、不负责任和不够专业，恢复苏联的目标只是得到了形式上的体现，最终转变为对社会的欺骗，并造成引发制度危机的自我隔绝。

现代化方案不折不扣的要求是对该方案预见到的“最高改

^① 非常重要的是，美国和除日本以外的其他现代发达国家，都不是自己培养人力资源，而是输入除管理人员之外的所有专家人才。输入人力资源固然可以节约相应的开支，但大规模的教育与医疗保障体系缺乏效率已成为未来一些严重问题的根源（尽管社会大众未受过教育简化了对他们的管理，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其明显）。